

往事如昨

父亲的扁担

孙介法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有一根很长很长的扁担。我长大了才知道，这根扁担是老槐木的，很结实。经过几代人的汗水和油渍的浸润，它显得光滑而厚实。这根扁担有七尺多长、三四指宽，从中间往两端渐窄渐细，靠近两头还各有一个小木疙瘩，这是一根挑扁担。两头的小木疙瘩是挡着绳索的。听父亲说，这根扁担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。

旧社会，我家祖辈人口多而田地少，日子过得非常贫苦。到了我父亲这一代，又赶上连年战争，灾荒不断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光靠耕种那几亩薄地是无法维持一家人生活的。于是，父亲便开始学着做小本买卖。

他先是当“两响”，挑着担子走四乡。他只是卖些羊肚子手巾、洋袜子和针头线脑等日用品，后来挣了一点钱，又添了一点本儿，于是父亲就当上了货郎，专门卖些粗布、小布等布匹。父亲就是用这根扁担挑着沉重的货物拉乡卖货。他一手扶着扁担，一手摇着货郎鼓，每天翻山越岭，不知要走多少远近大小的村庄。

然而在那战乱加灾荒的年代，什么买卖也挣不到钱。后来，父亲又学着烤火烧。烤火烧这买卖母亲能帮上忙，实指望两个人齐下手，能够多挣点钱。母亲是小脚女人，但是她很能干，不管是地里的农活还是家里的营生，她都做得干净利落。烤火烧的面粉都是先余回小麦来，放到盆里，加上水淘洗干净，晾晒好，然后上磨推出面粉来，再发面烤火烧。磨面粉是很苦累的活，可是这活大都是母亲一个人来干。母亲推着那厚厚的、沉重的大石磨，经常是汗水浸透了衣衫。夏天实在太热了，母亲便叫我去关上街门，索性脱下她浸透了的衣衫，光着膀子推磨。看着瘦弱的母亲推着那沉重的大石磨，一步步非常吃力地走着，脊梁上的汗水顺着脊背流淌着，我心疼得很，于是我就跑上前去，倒背着小手帮她拉。可惜我个子太矮，人又瘦弱，使出那点蚂蚱劲儿并帮不了多少忙。母亲说：“孩子，不用你啊，你太小了。”

我很不情愿地退出磨道，便走到大筐跟前，去替母亲罗面粉。其实罗面粉我也不会干，弄得满手满胳膊都是面。

下午，父亲拉乡或赶集回来了，就和母亲一块烤火烧。我家烤的是“杠子头”火烧，面

硬，有劲道，烤出来的火烧个头儿大。揉面做火烧时需要拉开架势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才能揉出劲道的好面来。我家烤出来的火烧口感极好，有嚼头儿，还有香味。我父亲在面板上做火烧，我母亲就在鏊子上烤。炉火熊熊，鏊子烘烤得人不敢近前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，父亲和母亲汗流浹背。可是我的父母一炉一炉地一直烤到大半夜，两大筐火烧才能烤好。有时候，我闻到火烧那特有的香味，便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，走到火烧筐子前，定定地瞅着那微黄而散发着香味的火烧。有时母亲瞅父亲不在跟前，便偷偷拣一个有点糊花儿的火烧，赶快塞到我手里，说走吧，去掰一半儿给你奶奶。

我奶奶那时得了“偏枯”，也就是现在说的脑血栓，已经不能下炕了。我赶紧来到套间里，使劲掰一大块火烧塞到奶奶手里后，自己就赶快躲到一边去吃。这时候，我看见父亲用他那根扁担挑着满满两筐火烧，大清早就拉四乡叫卖去了。

那时候家家穷得叮当响，很少有人吃得起火烧，有买的也只是买个仨俩的给孩子解解馋儿。父亲挑着两筐火烧，不知要走多少崎岖坎坷的山路，不知要流多少汗水，不知要串多少大街小巷，卖到半过晌回来，还常常剩下大半筐。

卖火烧也挣不到钱，父亲又学着做豆腐。做豆腐更是苦累买卖。首先是“拉碴子”，也就是把余来家的黄豆粒子用簸箕扇簸干净，然后上大石磨上磨碎，再用簸箕扇出豆皮儿来，只剩下那黄灿灿的豆碴子，再倒进大盆里用水泡。当豆碴子吃足了水以后，再上水磨上磨。母亲弓着身子，吃力地推着大石磨，那黄灿灿的豆浆便顺着石磨缓缓地流淌下来——这活也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干。因为上午父亲挑着担子出去拉乡卖豆腐，母亲在家就得做好这些筹备工作。等下午父亲拉乡回来，两人再一起做豆腐。

做豆腐的工艺也很复杂。先是把豆汁舀进大锅里，烧火熬到一定的火候，然后用一个特制的圆形平底有木柄的家什来挤压——这是父亲干的活。父亲在锅台上站着，双手握着那家什的木柄，很卖力气才能挤净豆汁，剩出豆渣来。然后将豆汁加热到一定的火候，便一瓢一瓢舀进瓮里。父亲一边用那特制的长

柄木勺慢慢地、轻轻地上下搅拌，一边加上适当的石膏和卤水，瓮里的豆汁便成了颗粒状，这就是所说的卤水攢豆腐。再经过好几道工序，最后才做成又白又嫩的大豆腐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父亲就用扁担挑着豆腐去拉乡。父亲肩上挑着豆腐担子，还得腾出两手敲着豆腐梆子。大老远听到这清脆的梆子声，人们便知道卖豆腐的来了。卖豆腐当然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独份买卖，到秋后地了场光时，许多农民都想做豆腐挣俩钱儿。用现今的话说，那时候做豆腐，竞争对手也不少，这买卖也是不好做的。

父亲挑着豆腐担子，在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在凛冽的寒风里，父亲两手无休止地敲着他那个已经敲得有了凹陷的豆腐梆子，满心希望有人走出家门招呼他：“哎，卖豆腐的，俺割点豆腐！”然而很少有人走出家门招呼他。父亲每一天都在希望和失望中，挑着沉重的豆腐担子坚持不懈地奔走着。可是一担豆腐常常卖到过了晌还没卖完，父亲不得不往一些老主顾家里送。一向严肃的父亲，提溜着几块豆腐的筐子，走进人家大门时，便笑容可掬地说些好话，让人家照顾一下，无论如何把这斤豆腐留下。父亲肩上虽然挑着好吃的豆腐，但是他却常常饥肠辘辘地挑着担子转回家来。

父亲成年累月地用他这根扁担，挑着沉重的货物，也挑着养活一家七八口的责任，还挑着一家老小沉重的日子。父亲的双肩虽然被扁担磨起了厚厚的肉疙瘩，但他的腰背却没有被压弯……父亲很像他那根扁担——站着是一根，躺下是一条！

后来父亲老了，腰也弯了。他再也挑不动东西了。于是，他就把这根扁担交到了我二哥手里。我二哥接过了这根扁担，那时候已经成立了农业合作社。在生产队里干活，二哥就是用这根扁担，挑过土粪，挑过地瓜，挑过花生，还挑过高粱穗子和豆秸……二哥还用这根扁担，去东山里头挑过松柴，去虎头崖海滩上挑过蛏子、蛤蜊和海蛎子……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父亲这根扁担早已被淘汰了。这根扁担早已被我珍藏在一间闲屋里。有时候看看它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的艰难困苦来。



怀故人

父亲

林升

思忖好久，一直不敢写出父亲两个字。或许是眼泪太重，或许是怕把自己带人失眠的深夜，眼泪反复验证着黑夜和白昼，那些不能自抑的记忆，犹如雨后春笋般正被一层层剥开。

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他是家里的老大，有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。从小身体瘦弱的他却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最苦命的是父亲摊上了嗜酒如命的爹和极度自私的娘。父亲的童年境况我从来不敢想象，自我记事起，就知道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不融洽。当然也有父亲的原因，他性格耿直，做事直来直去，从来不会委婉些。正因为这种性格，父亲吃了一辈子亏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老爷爷非常疼爱他这个孙子，父亲叔辈兄弟九个，老爷爷为父亲做媒娶到了我母亲。母亲给这个家庭注入了新的血液，也为这个家庭酝酿了第一缕绿意。她用自己的善良和热心感动了左邻右舍。

农村大集体时代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父亲受到很多伤害和责难。但是年富力强的父亲仍勤劳努力地在阳光下活着。他被星戴月穿梭在庄稼地和家里，在生活的漩涡里转着圈。父亲有着清瘦的脸和坚毅的目光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，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故乡那片土地上。许多谜一样的细节，被岁月凝结成枯黄的故事。

2000年，我们兄弟两个和小姐姐在烟台做生意。那时候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，父母下决心到烟台，当时只有我哥在烟台有一处房子，姐弟几个都住在一起，父母来了住宿的确是个问题。我们知道父母做出到烟台的决定是很难的。都说故土难离，母亲时常唠叨，老家啥也没有了。父亲更是少言寡语，心沉如铁。父亲很少喝酒，却烟不离手。来烟台前，母亲就告诉他去城里孩子家里就别吸烟了，烟瘾很重的他答应了，真把烟戒了。来到烟台后，勤劳的父母也没有闲着，找了一个打扫大街的活，每天天不亮就匆匆忙忙吃顿饭去干活。有一天小小姐姐路过父母扫街的地方，

看到他们的背影，心痛到了极点。等我们有了孩子后父母结束了打工，母亲在家专职照顾我们的孩子，父亲更是忙前忙后。

后来父亲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，他年轻时头部受过伤，在老家就神经衰弱，常年吃药。后来经我叔介绍去一家私人诊所看了几次，感觉有效果，所以经常一个人坐车去那里诊治。有一年冬天在我家吃饭后，父亲要回我哥哥家，在门口穿鞋时差点栽倒，嘴角也有些歪。第二天去医院得知是肌肉萎缩，开了些药回来，吃了几天感觉也没见好转。在一个很冷的早上，父亲又自己去那个私人诊所，直到晚上六七点也没回家。母亲有些慌了，打电话告诉我们，到晚上九点多接到救助站的通知才把父亲接回来。我看着父亲呆滞的眼神，当时以为是冻坏了，赶紧拿出厚被给父亲盖上。第二天早上伸手一摸湿漉漉的，是父亲尿床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不好，赶紧送到医院。父亲在医院住了十七天，出院时走路没什么问题，只是从此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，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有一天傍晚，突然接到母亲带着哭声的电话，说父亲在家里摔倒了，我们急忙赶回家，看到的是父亲痛苦抽搐的脸。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和年龄，我们放弃了手术治疗。此后父亲只能坐着或躺着，父亲忍受着身体的病痛，母亲则心力交瘁地照顾着三个孩子和父亲。从此，每次给父亲洗澡，看到他越来越瘦的身体，我的心都有一种裂帛之痛。

去年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腊月的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父亲发烧了。我把父亲送到医院后，他一直昏迷嗜睡。在医生的治疗和姐姐的细心照料下，父亲挺到了过年。或许是父亲求生欲望太强，昏迷十几天后，他睁开了眼睛。他熬过了春节和正月十五，正月十八中午12点，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父亲去世后，从来没有到过我的梦中，或许他不想打扰我们。青烟散尽，哀伤却厚了一层又一层。父亲，想我了，就来我梦里看我吧！父亲，我们想您！